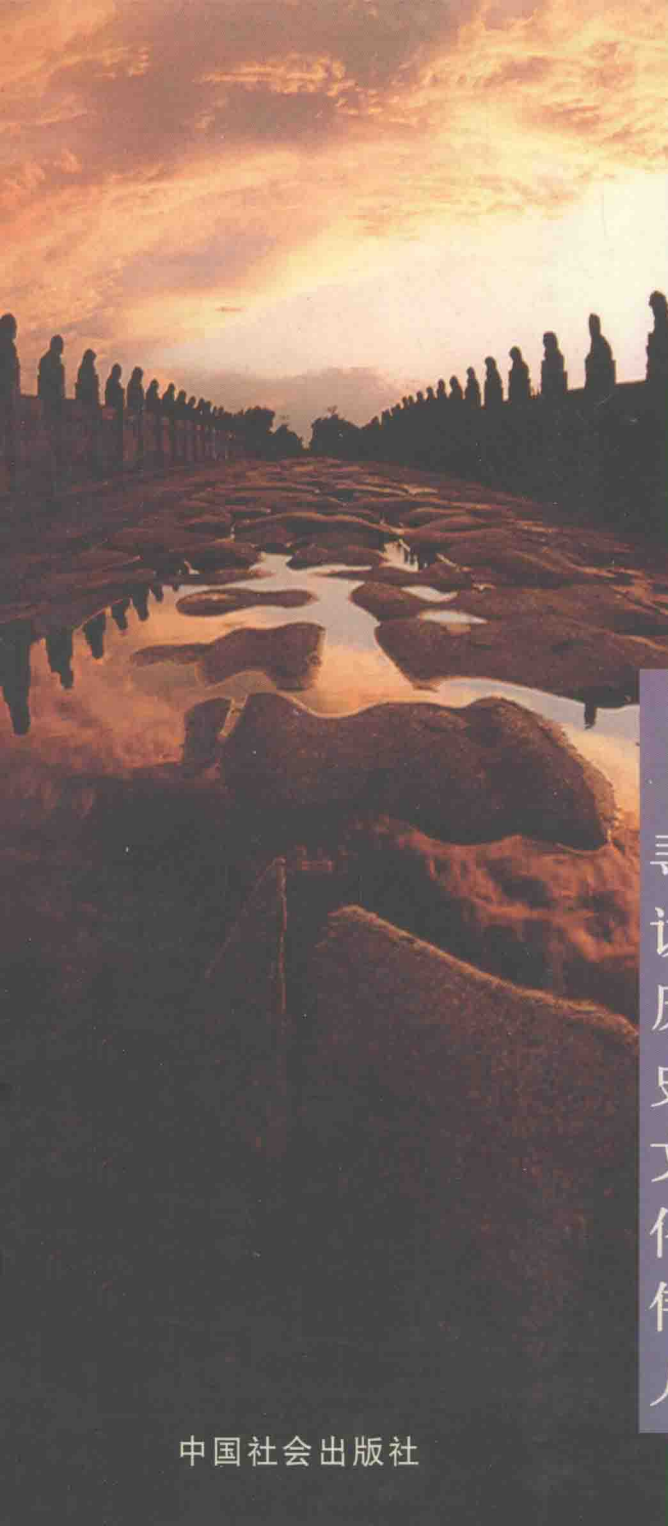




神游千古

——
寻访历史文化伟人

◆ 郑晓江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神游千古

——

平遥历史文化名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南昌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赣学”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资金共同资助

神游千古

◆ 郑晓江 著

—— 寻访历史文化伟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 / 郑晓江 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9
ISBN 7-80146-720-5

I. 神… II. 郑… III. 哲学研究 - 文集 - 古代 - 人物
IV. B.05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617 号

书 名: 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

著 者: 郑晓江

责任编辑: 张英杰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振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 千字

印 数: 01-2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720-5/B.172

定 价: 18.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数年来或车或船,或行或卧,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间,徜徉在老树古村荒野之旁,回归自然,寻觅传统,咀嚼文化,最后命之笔端,结集成册的。本书试图展现历史文化伟人真实的生活与人性,获得更深沉的文化历史意韵。作者试图运用思想考古的方法,“把经典还原为人,把人还原为生活”。一次次实地寻访的过程,无疑就是将一位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一生放在具体时空中作一整体的审视,从其所居之地、所学之处,活动的地方、安息之处,我们可以读出越来越多的典籍中没有的东西,这些信息就隐藏在山山水水之中,潜伏于老树古村民宅之内。通过实地的考察,认真地思考,以及旅途中同道们的辨识,能获得许许多多图书馆、课堂、书斋中都无法得到的东西。每当有那么些新的发现,那怕只是一点点,都可引发我们内心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灵魂中的快乐。

悠游千古 意接圣贤(自序)

我常跟学生们说，自己是一个好神游者。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被无穷外在需求所“执”、所“缚”，不仅深感身倦体劳，更觉精疲神伤。滚滚红尘何时了？滔滔欲壑何时休？人们何不跳出这些外在的束缚，意识到：唯有心静方可有身静，唯有神游方能体休。于是，我们何不或车或船，或行或卧，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间，徜徉在老树古村田野之旁，去回归自然，寻觅传统，咀嚼文化，去展现真实的人性，去获得更深沉的历史文化意韵。

这些年来，我在读书教书讲学著书之余，常常利用休息日或寒暑假，出游在外。一方面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自然山水之间，超越时间的间隔，去与历史伟人处于同一空间，来达到感同身受

的效果,以获得在经典的阅读中难以掌握的思想家们背后的一面,那更深层的东西。岁月流逝,寻访的次数多了,于是,体会渐渐多起来,感受也越来越深了,命之笔端,便有了眼前这本《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一书的撰写。

我访庐山东林寺,主要是想去感受净土宗创始人慧远大师。但却对1928年访庐山的胡适先生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当时,胡适先生亲临考察庐山的山川之秀,兼及精研庐山的佛教,后来他写道:“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趋势。”有许多文章对这段话大不敬,认为不确切,有问题。我倒觉得,胡适先生的感受相当深刻。观净土法门,如此简便易行,如此切中人们逝后往生西方极乐的心愿,我不禁在内心感慨:诚哉斯言。所谓中国“佛教化”,是指由于净土宗教理仪规简便易行,信众日隆,中国有走向佛教化国家的趋势;所谓佛教“中国化”是说,由于慧远创立的“格义”方法,用中国固有文化来诠释佛理,使佛教走向了中国化的道路。这二种趋势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则又让我感到东林古刹、净宗文化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中之地位真是无以伦比。

我去宜春访禅宗沕仰宗祖庭栖隐禅寺与慧寂大师,深深地感受到地方上某一处特殊的山水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比如仰山之于宜春,决非仅仅是地理上一脉高山而已,它早已化为宜春文化血脉中最重要的一支,影响渗透进各个方面。千百年来,仰山曲折的山道、秀丽的风景曾迎来许许多多的鸿学宿儒,如韩愈、陆希声、祖无择、张商英、黄庭坚、范成大、辛弃疾、朱熹、严嵩、王光烈等等,他们或谒神,或游览,或踏青,或

会友，然后必赋诗为文，积淀成了深厚悠久的仰山文化。当然，约一千一百余年前，在崎岖的山道上，来了一位跛脚的和尚慧寂大师，使这里又成为禅宗沩仰宗的祖庭之一。可惜的是，这一宜春文化的血脉似乎已中断，现代的宜春市似乎已与仰山文化无多大的联系，而现代的宜春人也早已不知这些了。在今日的宜春，到处可见条条横幅——“生态农运，人文宜春”，因为2004年10月，宜春将举办全国农运会。从生态上看宜春，的确感觉很好，青山绿水，山形圆润，我觉得，宜春的山水与别处不一样的是：大自然与人非常亲近；可是恕我直言，“人文宜春”之“人文”何在？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已无法体会到宜春文化的独特魅力了，因为仰山文化的血脉没有流淌到今天，这样，宜春市的独特性便难以显现。这是我在清晨与杨教授徘徊在美丽的秀江岸边所想到的。

我又来到靖安宝峰禅寺，寻访马祖的归骨之地。这也许是江西省最大的一座丛林，方丈是现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和尚。我站在靖安宝峰寺新落成的佛学院教学大楼上，远眺四周如诗如画的山山水水，心中总在想：像马祖这样的禅学大师，一生精进于佛法，究竟要解决什么世俗的问题呢？当然是生死问题，是生从何来，死到何去的问题。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正月，马祖道一大师再登石门宝峰，见“洞壑平旷，顾而乐之”，对一旁的僧人说：“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兹地矣。”马祖回钟陵开元寺(今南昌佑民寺)不久，染疾卧床，众僧关切地问：“大和尚觉得如何？”马祖云：“日面佛，月面佛”。这句话出自《三千佛名经》，经中说“日面佛”有寿一千八百岁，而“月面佛”寿只一昼

夜。马祖临终前说这句话的深意为：人嘛，寿一千岁也好，活一昼夜也罢，此生理性生命的长短并没有什么好执著的，关键在明了生死之道——佛法，做到长命也安然，短寿亦安心，生死不染，去住自由，岂不快哉！我联想起，有一次晚饭后看电视，在2004年1月27日，陕西省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节目“金庸陕西行”。在法门寺，金庸先生与法师们座谈，在讲到学佛的心得时，他说：“学佛使我不害怕死，对名利也看得淡了”。平平常常的语言，朴朴实实的道理，无有他哉！从千余年前的马祖大师到今天的金庸先生，他们都在佛法中汲取卓越的生死智慧，这实际上也是我这些年来沉潜于佛学的主要原因。

我又来到奉新百丈寺，想寻访怀海大师的遗踪。在青砖黑瓦木柱的祖师殿内，我看见了百丈寺的开山祖师怀海大和尚的塑像：供桌后垂下一张黄色刺绣的大幔纬，透过宝葫芦形的空档，一位白眉修长的慈祥老人正看着我们。这尊怀海大师的坐姿塑像金碧辉煌，栩栩如生。我合十上香，顶礼膜拜，忽然想起著名禅僧西堂智藏赞怀海的一段话：“灵光独耀，迥脱尘根，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在中国禅宗史上，怀海大师的确是禅学天空上“灵光独耀，迥脱尘根”的一颗耀眼的慧星。其一生有两大功绩：一是适应历史潮流，折衷佛教大小乘戒律，制定了《百丈清规》，被誉为“励禅门之戒行，为一宗之洪范”。另一方面，佛教东传中国，僧人们主要沿习了“沿门托钵”的制度，或由香客、居士们供奉。到了怀海大师驻锡百丈山的时代，在这“人烟四绝”之地，如何供越来越多参禅者的衣食，成了怀海传法的关键问题之一。他直接宣布：

“佛是无着人，无求人，无依人”；而接受布施者，则“乞施主一粒米，一缕线，个个披毛戴角，牵犁负重，一一须偿他始得。”怎样才能做无求人、无依人？怎样才能跳出报应的圈子呢？当然是扛着锄头去垦荒了。我后来站在寺后“天下清规”的石刻旁，透过碧绿的竹林，远观百丈寺前连片的田畴。春雨已灌满，许多田地已犁开，山里水冷，季节要晚一些，用不了多久，缁衣与农夫将在田野里忙碌。千百年前，怀海大师又带着多少僧人实践着他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呢？可见，一种文化在异域的传播，必得和异域文化相适应，其“损”、其“益”皆是不可避免的。适应这种必然性，做了开创性的文化发展工作，将在人类历史上划下深深的痕迹，永垂史册。

我还专程到江西永丰县沙溪镇，作了一次欧阳文忠公故里行。欧阳修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为有宋一代文章宗师，有“六一风神”之称。何为“六一”？欧公有名篇《六一居士传》云：“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我似乎亦有此志，奈何时不济，财不济，才学更是望尘莫及矣！我独在欧阳文忠公祠堂内徘徊，忽想起欧公有句名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这话寓意十分深刻。作为醇儒的欧阳修，他追求的是“人死留名”，人不可能不死，而死又是如此紧逼，因此，人就应该去追求无限性的存在——不朽。一个儒者通达此路的最佳途径是：立德、立功、立言。欧阳修一生除了直接在朝为民为国为君殚精竭虑外，便是将自己的思想贯之笔

端，书之史册，以传诸久远。他以深厚的古学功底，大胆的怀疑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对《易》、《诗》、《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中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倡导了一种舍传求经、去伪存真的方法，开创了经学和儒学发展的新局面。事实上，疑经的风气自欧阳修以后成为宋学的一大特色，这不仅为学者研究经典开辟出新路，同时更拓展了儒者们的思路，使人们大胆地走出经典，去寻求更深奥的儒学义理，从而使宋明理学的诞生成为可能。此外，欧公还有二大历史贡献：一是撰写了“泃冈阡表”并刻碑，提倡一种“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的孝道精神，对中国人之民族性塑造有莫大的影响。二是在泃冈阡表碑石之后，刻着《欧阳氏世次碑文》，不要以为这只是欧阳修撰的欧阳一族的族谱而已，我觉得这不多的文字在建构儒家民间社会的秩序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之有谱牒，由来已久。不过，在欧阳修倡“小宗谱”之前，凡谱或为帝王、诸侯之谱，或为贵胄豪门之谱。在唐末五代，天下大乱，谱牒多所亡佚。北宋以降，众多儒家学者，如欧阳修、曾巩、苏洵、李觏等皆大倡修谱。其直接原因是，经长期的战乱，谱牒散佚严重；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儒家学者试图将儒家伦理渗入民间社会，用儒家的价值观重建民间社会的秩序。欧阳修在仔细分析了历史上谱牒之利与弊的基础上，订立出修谱的新模式，即放弃“百世不迁的大宗法”，而用所谓“五世则迁”的小宗法，欧阳修根据此法主持修了《欧阳氏谱图》，虽然有一些讹误之处，但谱图结构简单，脉络清楚，修缮简便易行，故一经面世，便风行天下，至今仍然是中国民间修谱所遵循的主要模

式。站在《欧阳氏世次碑》前,我觉得,修族谱决不仅仅在于记载家族的历史以补正史方志之不足,欧阳修大力振兴地方民间的谱牒之学,其意义更在于使儒家伦理深入民间社会,以维系古代社会最底层的结构。

我又驱车来到南宋大诗人、理学家杨万里的故乡江西吉水县湓塘村。徘徊于曾经养育了先贤的村庄,我总在想,眼前充满着圆润柔和气息的江南小村,何以会培育出如此刚介耿直的杨万里呢?想起所看到的《杨氏族谱》,根据此谱的记载,唐末五代,陕西弘农杨氏后裔杨辂,奉旨任吉州刺史,爱江南水乡风物,一日与二个儿子杨锐杨延骑马沿赣江下行,忽见一水土肥美之地,便命大儿子杨锐定居,取名杨家庄。再信马而行,杨辂的坐骑不意陷入一处泥沼之中,他翻身下马,叹道:马陷泥沼,非天意乎?遂命杨延在此定居,并取名“湓塘”,“湓”者,泥沼之谓也。时光如梭,唐时的泥沼之地,渐渐成为物阜水美人众的江南村落了,杨辂也成了南方弘农杨氏的始祖。可见,杨万里的家族流淌着北人的血性,中原大地给人们培植出的那种粗犷执着坚韧不拔的性格仍然起着重大影响。杨万里在中国历史上,以诗名显扬于世,很少人知道,他在儒学发展史上,也是贡献巨大的学者。从世界文化史来看,人类每一次大的文明进步,皆需复返原始文明,从“源头”获得“活水”,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起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而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亦奠基于对儒家最古老经典进行的重新阐释之上。在这一时代思潮中,作为诗人的杨万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有无用之学,有有用之学,训诂者,无用之学也,学之伪也。”为超越汉唐

儒训诂章句之“伪学”，求得真学问，他先后作《心学论·六经论》和《心学论·圣徒论》，这二十篇文字，被冠之以“心学论”，说明诚斋先生试图抛开一切加诸儒家经典之上的传注章句等，直契儒家原始经典和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己之“心”明“经”之理，通过深入地开掘，重现儒学深层义理，再展其生命活力，尤其是力图寻找出儒学的真精神以为时代之用，这与其在诗词领域独创“诚斋体”一样，显示出他在思想史上亦有其独特的见解。

我又来到南宋时的吉州庐陵富川，今之吉安市青原区富田乡文家村，想寻访状元宰相文天祥的遗踪。行前我曾仔细阅读了许多关于文天祥的资料，发现很多的学者都对《宋史·文天祥传》中的一段话：“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颇有异议。我倒觉得这段话虽有过分之处，但决不能认为天祥家缺少钱财；特别是不要认为，家财万贯、生活奢侈就没有资格做民族英雄。在进文山村时，带我们去寻访的钱老师就说，在富田镇，早年还有文天祥家族的许多店铺。我心想，真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七八百年过去了，文氏仍然是个殷实人家。在观看竹居遗址、文山村及天祥隐居地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觉到：天祥家一定比较富有，他当然不是贪官污吏，而仅仅以一状元身份，就足以保证他收入颇丰。在其隐居时，各方人士一定是络绎不绝地来到文山，求字、求序、求学，润笔束修一定不会少。对于古之文人来说，这是一笔大收入。要不，天祥何以“毁家”便能组成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没有巨额财产恐怕是不行的。其实，家境富裕决不会降低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相反，正是他家财颇丰才成就了他的抗元事业。我来到了富田乡鹞湖大坑村东北处

的虎形山间瞻仰天祥墓园。立于墓前，我远眺四周，发现这真是一块风水绝佳的宝地。墓建在虎形山之虎鼻的位置上，两边有两条犹如巨龙般的山脉围护，前面是顶部平坦的照壁山，似乎是一永久的摆放供品的祭桌。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赴吉水县参加纪念文天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来了许多文氏后裔。休息时，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什么民族英雄的后裔，都是“汉奸”的后裔。此话讲得有些难听，但却自有起因。天祥本有二个儿子，但一个死于战乱，一个早夭，都未能活下来。用民间的话说，他绝后了。所以，天祥遗骨下葬时，为他披麻戴孝刻石的文升并不是天祥的亲生子，而是天祥的兄弟文璧的儿子。天祥兵败被俘，早已下了必死的念头，但他最放不下心的有两件事：一是两个亲生儿子已死，自己绝了后；二是老母在他转战广东时客死崖山，无法运回故乡安葬。二者皆是“孝”的问题，它们像巨蟒一样撕咬着以孝子著称的文天祥的心。我想，对天祥而言，再大的肉体折磨和死亡的胁迫都不怕，而“不孝”之名却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痛苦得灵魂都出窍了，怎么办呢？文璧是与天祥前后中的进士，和哥哥官场局促坎坷不同，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元军大举进攻时，他正知惠州，也曾积极备战。但在锐不可当的元军锋芒面前，尤其是在南宋小朝廷已无回天之力的形势下，文璧终于献城以降。以一般道理推之，天祥必定会对文璧的降元怒发冲冠，誓要割袍以断手足之情。可是，天祥对此却表示出同情的理解。个中原因何在呢？因为，天祥心中最重的与“天道”相通的“人道”有二个方面：一为忠，二为孝。古来忠孝难两全，不过，天祥却找到了一个两全的选择。他觉得，自己一死

以为国尽“忠”；其弟文壁却应该留下来为家以全“孝”。所以，天祥撰《哭母大祥》一诗云：“……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泪滂沱。夫人开国分齐魏，生荣死哀送天地。悠悠国破与家亡，平生无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作门户谋”是指文壁降元以承文家的宗祀，而他自己则即便死后也要“正首丘”，保持南宋大臣的节操。“国破”固然使天祥痛心疾首，而“家亡”亦是其最为揪心之事。文壁降元，全家香火得以保全，又得以运母亲遗骸返庐陵安葬。天祥自然会对文壁降元表示理解。因此，如果不是教条地去看待文天祥的忠义，并且联系到儒家孝道的观念，我们就应该理解天祥对文壁降元的态度，因为，这二者皆是“天道”与“人道”中本有之义，而这，正是天祥努力去完成的。如果再往深处思考，我想，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有“宁折不弯”的传统；但在民间社会，也有“宁弯不折”的意识。前者是宋之文天祥、近代的谭嗣同等人坚执的；后者是文壁等人、尤其是百姓们奉行的。我由此还想到了儒家思想中本有一种“权”的观念，孟子就说过，“男女授受不亲”，但是，若在“嫂溺”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援之以手”，此之谓“权”。生命延续也许是中华民族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观念，在特定的外族入侵下，要有文天祥、谭嗣同这样的民族脊梁，宁死不屈；但从芸芸众生而言，不能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死途，他们要承受苦难，坚韧不拔，以无比的忍受力，延续着民族的大生命，是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正是中华民族历五千年而不亡之奇迹的根源所在。相反，历史上那些入侵、占领中国的外族，许多已经同化入中华民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

世界上远古的伟大民族至今也一个不剩,全都中绝了。人们在感慨中华民族无比的生命韧性时,难道就不能理解如文壁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吗?不幸的是,历史上正是如此,文壁先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后人也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他,甚至他的后代也都归宗在文天祥之名下,宋元明还有许多嘲讽之诗文谴责他的变节。但我觉得,文壁也许承受着比天祥更深更大的心理压力 and 痛苦,因为他的行为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相左,也因为他不是一介平民百姓,而是由正规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儒生。但我们如果不是从抽象的观念或“神”的角度去看文天祥和文壁,就应该既理解天祥为国捐躯之崇高气节的伟大,也要理解天祥同意其弟投降、文壁做了元朝大官以尽“孝”的事实合符人情。

1922年,胡适先生偶读《直讲李先生集》,惊讶地发现了被淹没了近九百年的李觏思想的卓越之处,并欣然以《记李觏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为题撰文介绍李觏。他说“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因此,我现在热心的介绍他给中国研究思想史的人们”。于是,我曾三访江西南城县、黎川县和资溪县,与罗伽禄、周世泉、杨雪骋诸先生徘徊于凤凰山,漫山遍野寻其墓址、寻其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盱江书院遗址,一无所获;后我们又在麻源山谷、麻姑山、资溪县之龙荫村、李氏庙等地流连忘返,想寻找到李觏先生的故居,亦了无踪影,不免有些惆

怅,有些哀伤,并引发出我无限的遐思。李觏一生可用四叹概括之:其自称为“邑外草莱之民”、“南城贱民”、“建昌军草泽”,但却为何能以独特的政论、易论、礼论而名世?此为可叹者一也;李觏拒绝参加进士科考试,认为这种方式是残贼人才之具,可他积极甚至钻营的举茂才异等科,两次皆不中,一生无科考功名,却在讲学于南城盱江书院后,从游者常百余人。后因范仲淹等人的大力举荐,入太学为直讲、说书,并曾权同管勾太学,故而“门人升录者千有余人”,“东南士人,推以为冠”,俨然“为宋代儒宗”,此为可叹者二。李觏没后九百余年,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高足容肇祖先生,希望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姜国柱先生钻研一下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李觏的学术思想,1984年,姜先生的《李觏思想研究》出版,自此之后,据不完全统计,研究李觏的专著有4部,论文八十余篇。南城草民为何能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引起世人如此关注?此为可叹者三。《李泰伯集》刻印较早,影响较大,可其生平事迹却颇为模糊,至今其故居在何处,难以定论;其有无后裔自明代始就成一争执不休的问题;而著名的盱江书院、李觏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可叹者四。可见,李觏的生命历程中,有许多的二难尴尬:生于草莱,心向往着官阙;学问为南方儒冠,却通不过科考;满腹经纶,却不能施展一点;一方面安慰自己功业不成,名于后世亦可,另一方面奔竞于豪门,几近乞求,渴望早入官场;生性刚毅,却对逝去的老母言“晚乃悔之”,想携母乞食于公卿大夫之家。这些人生中的二难尴尬,实形成了李觏先生一种内在的生命紧张,并发而为其人生活的动力机制,是其所思所行的内在基础。泰伯先生